



(美) 达斯科·多杰 著
张久安 朱欣民 朱玲 译

克里姆林宫的 权力之争



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之争

(美) 达斯科·多杰 著
张久安 朱欣民 朱玲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 萍
封面设计： 郑 强

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之争

(美) 达斯科·多杰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遂宁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29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642-X/C·103

印数：1-30000

定价：3.45元

译者序

自从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由他积极倡导和推行的“根本性改革”已成为世人关注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读者十分关心的大事。然而，苏联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改革需要达到什么目的？需要利用什么途径？这些却是我一般读者知之不多的问题。从更深层次上看，经过70年革命和建设的苏联社会主义，究竟遇到了哪些方面的挑战？领导层内部对这些挑战有何看法？为何领导人如走马灯一样相继上台，又昙花一现般地接连逝去？为何戈尔巴乔夫能异军突起、刻意创新？这些就只能是苏联问题专家能回答的问题了。

美国著名记者达斯科·多杰就是这样一位专家，他的《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之争》就是上述问题的最新答案。多氏系美籍南斯拉夫人，早年入华盛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

YBA 6/11

苏东问题,1968年出任合众国际社驻莫斯科特派记者,1971年加入《华盛顿邮报》编辑部,任苏东部主任,曾四次前往苏联采访。从1981年到1985年,多氏出任《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首席记者,他利用自己通晓南斯拉夫语言和克里姆林宫内情的优势,大量结交苏共上层人士,获取了许多内部信息和小道消息,加之苏联官方的报道,并身临其境地目睹了克里姆林宫最高权力如何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的易主过程,经过细心的分析归纳和假设验证,揭示出80年代苏联社会所面临的深刻矛盾,和保守派与改革派所进行的错综复杂的争权斗争。多氏于1986年底将此经历和心得著成该书,交企鹅出版公司出版。因其资料翔实、分析透彻,颇受西方大众读者的欢迎,遂于1988年修订重版,汉译本即根据该版本译出。

作为本书译者,我们意识到《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之争》一书对我国读者不无参考价值。它从西方人的角度分析了苏联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积重难返问题,以及苏共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矛盾方针和对立措施,有利于我们从正、反两方面来观察苏联的改革进程。另外,多氏在莫斯科的经历惊险幽默、轶闻趣事颇多,读来给人以知识和乐趣享受,对于我国普通读者了解克里姆林宫内幕、了解苏联的社会问题和人民生活、了解驻外记者的职业特点和工作情况,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庸庸讳言,本书作者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非没有问题,把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作为考虑问题的前提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立场,因而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面临难题的分析就不乏偏颇之

嫌。但是，作为一个追求客观事实的新闻记者和克里姆林宫观察家，多氏在守旧与革新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旗帜鲜明地鞭笞了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的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赞扬了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决心和大胆创举。我们相信，读者对书中的这些特点定能细心体察和鉴别，同时，也请读者对译文的不足之处提出批评意见。

译 者

1988年11月于成都

引 言

本书专门论及战后苏联历史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时期所发生的一连串国家领导人逝世事件，以及代表克里姆林宫年轻一代权贵的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上台背景。我出任《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首席记者时，正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经历长期执政后处于衰落的时期，因而亲眼目睹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如何从勃列日涅夫易手到尤里·安德罗波夫，又怎样从安德罗波夫易手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最后终于落到戈尔巴乔夫手里。本书虽够不上一部面面俱到的历史专著，仍不失为对当时事件的一部记者专访，并足以让人窥视苏联权力之争的隐秘。

自从1968年初夏以来，我一直在准备撰写一部这样的书，这个愿望积郁心中为时已经20年了。也就是那年初夏，我出任合众国际社驻莫斯科记者，从此开始追踪记录苏联的

政局变化。到了1970年12月，我转而加入《华盛顿邮报》，并有幸先后于1978年和1980年4次被派往莫斯科短期出差。从1981年到1985年，是我出任该报驻莫斯科首席记者的时期，1986年冬天，我又再次前往苏联出差。除此而外，我与苏联事务的关系还包括身居华盛顿报导莫斯科消息，以及从1973年至1976年出任《华盛顿邮报》驻东欧记者，当时的报导范围，北到波兰，南及保加利亚，遍及整个苏联集团诸国。

新闻记者出于职业习惯，喜欢过分强调自己所见所闻的重要性，而对自己鲜有所闻的东西则不屑一顾。这种职业性的毛病在莫斯科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当地，除了苏联政府有选择地公布一些消息外，很难获得其它什么信息。因此，我有一套自己的对付办法，这就是认真研究可以获取的证据，再尽可能地推断出自己的结论。我充分利用起官方的新闻报道，再将达官贵人中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加以鉴别、派上用场，还引用消息灵通人士提供的可靠信息。我本人深感走运的是，自己曾有机会同若干与苏联四巨头有密切关系的人们交谈，而且他们愿意坦率诚实地谈吐，唯一的条件是不得透露其姓名。当然也得承认，无论四巨头的亲戚还是朋友，在这种情况下的谈吐仍是有所节制和选择的。

需得说明，本书的目的不在于通过比较或分析道德问题，以证明西方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在我看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用不着证明。我倒情愿从苏联本身的角度、从其历史地位以及文化和政治环境的角度，来观察苏联，因为苏联与我们的社会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在苏联耳闻目睹的，是一个百般僵化的政权向提倡改革的年青一代手中

的过渡。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定决心，要使自己的国家现代化，要改革斯大林立下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但他是否真能调整苏联的体制以服务于自己的目标，尚需拭目以待。

381
E31
393

目 录

第一章	莫斯科之夜·····	(1)
第二章	苏共的接班人危机·····	(21)
第三章	勃列日涅夫的衰落·····	(52)
第四章	安德罗波夫的赌注·····	(74)
第五章	安德罗波夫的胜利·····	(103)
第六章	安德罗波夫的新政·····	(119)
第七章	接班人危机再起·····	(166)
第八章	契尔年科昙花一现·····	(208)
第九章	戈尔巴乔夫异军突起·····	(254)
第十章	戈尔巴乔夫的新型革命·····	(273)
第十一章	雄心壮志与艰难处境·····	(307)
结语	戈氏前途预测·····	(323)

第一章 莫斯科之夜

莫斯科天寒地冻已经有好几周了。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烟雾和蒸气之中，使人倍感呼吸困难。每年2月是俄罗斯寒冬最难受的时节，莫斯科人下班之后，默默无声地争相踏上积雪覆盖的大街，拥入人群熙攘的小道。一般是下午4点，室外天色就显得昏暗阴沉了。而在这2月份的第二周，宽阔的大街和广场上一到天黑，就再也不见行人踪迹。人们如此匆忙往家里赶，为的是观看1984年冬季奥运会实况转播，那会儿各项的比赛正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举行。鉴于苏联的滑冰运动员们已经赢得不少金牌，举国上下就像被粘在电视机旁一样，无数双眼睛紧盯着屏幕上的曲棍球比赛，这是俄国体育运动中又一最有希望夺魁的项目。为了紧盯着苏联曲棍球队一步步地迈向奥林匹克冠军的历程，恋人们不惜更改自己的幽会时间，影院和餐馆不得不空守店堂。在俄国，人们

对冰上曲棍球运动的兴趣远大于国内政治，唯有天塌下来般的大事可以另当别论。而1984年2月9日那个星期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有什么戏剧性的政治事件发生。

若干时日以来就有各种谣言传出，说是上台只有15个月的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不佳。安德罗波夫自头年秋天以来的确在住院治疗，已经足足有173天没在公开场合露面了。另据报道，他的健康状况正在日益恶化。然而在莫斯科，那个星期四是非常平静的，我甚至怀疑除了权力中心的极少数人之外，还有谁真正知道莫斯科正在发生的事件。

邱吉尔曾经将克里姆林宫形容为“由模糊不清的神秘色彩紧裹着的阿葫芦”，这句话在西方已是家喻户晓，而用来形容那个2月的莫斯科夜晚，当尤为贴切。然而不知怎么的，我似乎察觉到了事情有些蹊跷。现在回想起来，我那天夜晚着实推测出了克里姆林宫内的动静，这一举动不仅使各国记者，而且使各国政府感到兴奋、沮丧，体验到了风险，明白了实情。

当时，我决定打开电视看看苏联节目，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完全是出于侥幸。苏联正处于全国性的议会选举活动之中，那个星期四夜晚的新闻节目是转播苏联领导集团最新成员叶戈尔·利加乔夫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我通常认为，苏联的政治集会只是重复一些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唯一的作用是催人昏昏欲睡。因而我当时自然以为，利加乔夫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托木斯克发表的演说决不会透露任何新的东西。但我心中也不无诧异，利加乔夫在西伯利亚默无声息地干了17年，是什么原因促使安德罗波夫一下子将他这位省级

官员提拔到中央，还委以苏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重任？安德罗波夫虽然长期患病，却仍然富有神秘色彩和吸引力，善于将生气勃勃和精明强干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例如，他曾经将苏联领导集团内最年轻的成员戈尔巴乔夫提升到中央，推上政治生活的前线，而戈氏以及安德罗波夫的其他门徒们，与老朽昏聩的苏联政客们毕竟大相径庭。戈氏这批人年富力强、自信心足、城市出身、行为果断，似乎还拥有很强的工作目的感。至于利加乔夫，当时升任党中央书记刚6周，我还无缘与之相见，因而想听听他的讲话，以便判断他是否属于所谓的“少壮派”。但是，当我看到他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并琢磨他的个性时，不禁为他讲话中的明显遗漏大吃一惊。他丝毫没有提及向托木斯克的市民转达安德罗波夫的问候，而这种问候句子在苏联领导的公开讲话中早已成为一种近乎法律规定的套话。

“安德罗波夫或许已经去逝，才不再转达他的问候”，我当时对妻子说出这句话来，仍纯属有口无心。这种缺乏以事实为根据的推断，的确会让人觉得是在捕风捉影。然而，这种明显遗漏又着实意义非凡。要是在美国，在任副总统或部长参加大选，或许有可能忘记向中西部某城的选民转达总统的问候，但苏联的官员们是绝难忘记转达克里姆林宫首脑的礼节性问候的。既然如此，利加乔夫的问候是否被技术专家们无意裁掉了？这显然不可能。那么是否是被新闻检查有意剪掉了？但这又为了什么？又系何人授权？

苏联电视节目在利加乔夫讲话之后改变了事前的安排，这进一步增加了我的疑虑。原定节目为瑞典流行歌舞团演出，但我妻子没有看到她喜欢的这一节目，而是发现身穿燕

尾服的音乐家们出现在屏幕上，演奏古典乐曲。15个月之前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先改变节目，改成乐曲演奏，次日清晨即发布官方讣告。看来眼下的举动正是在因袭以前那种全国性的致哀习俗。

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任何事件的重要性大于克里姆林宫的权力过渡，没有任何事件对国家和人民的影响胜于领导人的变更。过去的领导人更替发生得瞬间即逝、不可捉摸，令观察家们感到无规律可寻。唯有尼基塔·赫鲁晓夫是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罢黜的，其他人都像历代沙皇一样终身执政，最后寿终正寝于工作岗位。而且，在领导人临终之前，任何有关接班人问题的议论和安排，只能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密在本帮派政客之间进行，只要领导人一气尚存，就不得公诸于众。结果就确保了人们在领导人去逝之前，根本无法了解下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何许人也。一想到历经几周的期待，我们终于盼来了克里姆林宫风云变幻、争执迭起、交易盛行的这么一天，我的心情就显得十分激动。然而，我对此却没有获得任何信息。

自从安德罗波夫头年9月开始消失在公开场合以来，外交界和新闻界人士就一直在揣测他的健康状况和接班人属谁。大家之间占压倒优势的看法是受到安德罗波夫明确青睐的戈尔巴乔夫和勃列日涅夫派瞩目的契尔年科。为了弄清两人之间谁会走运，我几个月来一直在晚间加班加点，要么拨电话到处打听，要么打开广播电视，以寻找蛛丝蚂迹。眼下，我正将套间内的两台收音机打开来，但广播节目没有透露出任何有用的信息。于是，我们一家只好坐下来用晚餐，一边又打开电视机收看9点的新闻节目。可惜新闻播放得太

简略，不过，这也并非怪事。利加乔夫的讲话只是一带而过，屏幕上随后出现的是萨拉热窝的奥运会。激动的人群、狂呼的观众、鲜艳的色彩，无一不显出一切正常的迹象。

当我跨过庭院向自己办公室走去时，心中不由想到要分析出眼前的局势，非得从奥林匹克的狂欢声中脱身出来不可。他们之所以要死守住苏共领导人去世的秘密，就在于在接班人安排好之前必须避免公众的惊慌和困惑。因为，取消预定要转播的苏联冰上曲棍球队比赛只会诱发公众的气愤和诧异，说不定还会引起西方各国驻莫斯科使馆的警觉，从而嗅出克里姆林宫内的动静和苏联面临的危机。这样看来，我得集中精力寻找证据，再进行核准。但是老天爷，可供核对的东西太少了！

至于说到证据，只能寻求间接性的。住在莫斯科的人们，倾向于分析迹象和征兆来收集证据，而决非第一手的信息。即便已在苏联首都居住了若干年的外国人，也不能不为达官贵人不上电话簿感到吃惊。然而我本人却掌握着好几位官员的家庭电话号码，如果情况紧急，还可以登门拜访。但我也深知，这些人确信我不会用他们在电话上不情愿回答的问题去家里打扰。鉴于今晚的问题就属于这种不便打扰之类的，我觉得没有必要白白浪费我那来之不易的新闻职业投资去登门拜访和进行电话询问。所以，我兀自坐在办公室，像几个月来习惯的那样望着墙上绘着的苏联领导集团人员简图琢磨得出神，并不时给自己提出些疑难问题。接班人究竟是谁？能否是代表俄国少壮派的戈尔巴乔夫？或许老一代会将重任委与契尔年科？还是会突然冒出个其他什么人？

这个问题之所以举足轻重，原因在于安德罗波夫的总书

记任期虽然短暂，却透出了一线希望，使人看到了僵如顽石的苏联体制有可能迎来新时代的曙光。事实上，所有的迹象都证明戈尔巴乔夫是安德罗波夫理想的接班人和遗产监护人。但也应该看到，保守派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他们有可能推出契尔年科当候选人。如果是这样，那对改革政策说来就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挫折，这不能不使许多人感到忧心忡忡。现在看来，安德罗波夫的执政其实已经形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是契尔年科无法抵御的，也为后来戈尔巴乔夫的国家复兴计划奠定了有力基础。但在当时，局势仍不明朗，谁也不知道苏联正在经历一场权力移交之争。

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怀着一种沮丧心情，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禁不住想起床做点什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较为现实的选择是给一个叫瓦西亚的人打电话。他虽不是什么高级官员，但在要害部门工作，对于敏感消息拥有间接接触机会。我俩是老熟人，常在各种盛大招待会上见面，而他和我的摆谈也显得神态自若。我最近一次见他，是两天前在一次宴会上，他当然是按期而至，还告诉我说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我知道的就这些”，他一本正经地说。第二天，我又听到了几句这方面的谣传，于是发出一份电讯说，苏联领导人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已到了不能言语的地步。

尽管瓦西亚要我别独自同他会面，但我们仍然商定，一旦情况紧急，可用电话发出信号联系。他坚持说，这种信号必须从公用电话上拨出，如果他认为可以碰头，就会在20分钟内向我办公室的电话拨回同样的信号。

于是，我出得门来，驱车向列宁图书馆地铁站奔去，那车站大厅里的公用电话常被我派上用场。在夜晚驱车走这段

路，足足花了我10分钟，其间经过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大楼，只见灯光一片通明。我还注意到，地铁站外有军人在巡逻，是两名士兵和一名低级军官。我暗自记下这些不寻常迹象，又利用电话拨出信号，这才急忙赶回办公室等待回音。

可那一整夜都没有回音，因而也就找不到官员进行磋商。瓦西亚要么是不在家，要么是有意不理睬我的信号。

我办公室的通讯间是与东京的《朝日新闻》合用的，打印机上正在打出塔斯社的当天电讯简目，消息太简略，利加乔夫的演说词并没有全文发出。路透社的电讯集中报道中东问题，说是美国海军参与了贝鲁特发生的交火事件。《朝日新闻》记者胜子绘革是我的好友，这会儿也进屋来拿塔斯社电讯稿。他告诉我说，据法新社记者从瑞典首都报道，正在那儿参加东西方裁军会议的安德罗波夫之子伊戈尔，今天早些时候突然飞走。

我随即打电话向法新社驻莫斯科办事处询问，但他们回答说无法提供其它细节。然而，这条消息至少进一步印证了我早些时候的预测。利加乔夫讲话中的遗漏、瑞典流行歌舞团演出节目的取消，再加上伊戈尔匆忙离开斯德哥尔摩，这些肯定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这些单一事件综合起来，就逐步拼成了一幅完整的事态图画。而且，我还知道总参谋部今夜在通宵工作，这和勃列日涅夫逝世之夜的情况完全一样。既然如此，我得再进一步观察一下城里的其它战略要地，看看是否有不寻常的迹象。

这时已是夜里11点多了，莫斯科电台和电视仍在转播萨拉热窝的运动会节目。我认真考虑了一下，电视节目在运动会节目以后就会完全结束，届时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莫斯科电